

# 《三国史记》“国内”与“国内城”解析

苗 威

(山东大学 东亚文献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三国史记》是东亚重要汉籍,但个别叙述或简略或含混,以高句丽前期都城所在区域“国内”较为典型。其在《高句丽本纪》中的表述准确,《地理志》则有讹误,同时对置于国内的数座都城沿革没有明确勾勒。“国内”是鸭绿江北、浑江东的地区名称,早在战国就有土城的修筑。公元1世纪,高句丽迁都于此之后,先后在这一区域营建或翻修尉那岩城、京都、丸都城、平壤等都城。其中战国土城的旧址历经数次重修,名字次递是京都、平壤以及国内城,解释文本时需要审慎考辨。

关键词:《三国史记》;国内;国内城

中图分类号:K3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0)05-0115-08

高丽人金富轼(1075—1151)于1145年完成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人修撰的第一部正史,是研究东亚历史的重要文献。但个别记事存在简约含混的情况,比如对于高句丽前期政治中心的记载便是如此。高句丽早期都城位于“国内”,同时也有关于“国内城”的记载。毫无疑问,“国内城”是城邑名<sup>①</sup>,围绕其与“国内”的关系,学界认识不一。主要有前者是后者的省称,具体所指相同;<sup>②</sup>国内是包含国内城在内的地区,是地名;<sup>③</sup>以及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分具体的语境<sup>④</sup>等不同认识。梳理《三国史记》中的相关记载,进而系统分析,对于明确学术是非具有重要意义。

---

①学界普遍认为,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内的古城即是国内城,是高句丽的都城之一。20世纪初,日本人对集安市区内的古城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踏察与研究,参见[日]白鳥庫吉《丸都城及國內城考》,《史学雜誌》1914年第4、5號;[日]松井《國內城の位置について》,《東洋學報》1911年第1号;[日]鳥居龍藏《丸都城及国内城の位置に就きて》,《史学雜誌》1914年第7号;[日]關野貞《國內城及丸都城の位置》,《史學雜誌》1914年第11号;[日]池内宏:《通溝》上、下卷,日滿文化協會,1938年。中国学界自上世纪70年代始对此城进行系统发掘,参见苏才《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

②耿铁华《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及相关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第32页。

③刘子敏《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刘子敏《〈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刍议》,《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高於茂《霸王朝山城之考辨》,《学问》2002年第2期。

④魏存成认为不同语境下,情况不同。以《三国史记》中《琉璃明王本纪》与《地理志》互证,国内是国内城的省称。但据《地理志》所载“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政治中心在鸭绿江北岸的425年中,高句丽的都城不止一个,故而“国内”是地区名。参见《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 一、《三国史记》中高句丽第一次迁都的“国内”

高句丽最初的都城是纥升骨城(今五女山城),这里虽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sup>①</sup>,有利于据守,但在“安民以固邦业”<sup>②</sup>层面上先天不足,尤其是难以承载高句丽在朝贡中原王朝<sup>③</sup>的同时,突破边郡辖控的欲望。当“山水深险,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的“国内”进入到高句丽人视野的时候,迁都成为必然。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二十一年春三月,郊豕逸,王命掌牲薛支逐之。至国内尉那岩得之,拘于国内人家养之。返见王曰‘臣逐豕至国内尉那岩,见其山水深险,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王若移都,则不唯民利之无穷,又可免兵革之患也。’……九月,王如国内观地势。二十二年冬十月,王迁都国内,筑尉那岩城。”<sup>④</sup>

在这段以“国内”为核心的记载中,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国内”与“国内城”不是同一概念,因为引文中五次出现“国内”,皆是在“国内城”未筑之时,迁都国内之后,所筑之城名为“尉那岩城”,同一时期并没有“国内城”;如果“国内”就是城名,那么以高句丽立国之初的国力,不会在同一地区已有城的情形下,马上着手另筑新都城,名为尉那岩城。其次,在发现“国内”的过程中,郊豕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这应该仅仅是一种话语建构,因为从纥升骨城到国内(今集安市),在谷歌地图上测量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是 63.5 公里左右;如果从交通道路的角度看,由五女山城前往集安最近的道路是途经霸王朝的这条路,大约是 127 公里。<sup>⑤</sup> 在这段距离较长、地理环境复杂的路上,猪和人协同完成远足令人匪夷所思,因而将“逐郊豕”理解为传说<sup>⑥</sup>合乎情理。用祭天的郊豕逃逸作为迁都背景的真实用意,在于强调迁都是出于对天意的遵从。再次,“国内”和“尉那岩”皆是地名,但前者的概念外延大于后者。薛支追逐逃逸的郊豕,颇费周章之后,“至国内尉那岩得之”。由于修筑尉那岩城是在次年,即琉璃王二十二年(公元 3 年),所以尉那岩只能是地名,那么“国内”则更加不可能是城名。由此,“国内尉那岩”可以解读为“国内地区的尉那岩”。从这个意义上讲,“迁都国内,筑尉那岩城”的意思就非常明朗,即迁都于国内地区后,修筑了尉那岩城。所以,金富轼在这则史料里的表达具有严格的标准:其对于城名,所采用的文本结构是“名词+‘城’字”,如“尉那岩城”;地名后边则不加“城”字,如“国内”以及“尉那岩”。

关于高句丽第一次迁都的情况,在《三国史记·地理志》中尚有另一段记载“自朱蒙立都纥升骨城,历四十年。孺留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或云尉那岩城,或云不而城)。……又总章二年,英国公李勣奉敕,以高句丽诸城置都督府及州县,《目录》云‘鸭绿以北已降城十一,其一国内城,从平壤至此十七驿。’则此城亦在南北朝境内,但不知其所耳。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sup>⑦</sup>

此段史料中,“国内”出现一次,“国内城”出现二次。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金富轼的自注,还是正文的表述,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其一,在解释《目录》所载之“国内城”时,著者坦然承认:虽然可以明确此城“在南北朝境内”,然而却“不知其所”,说明金富轼根本不确定国内城的准确位置。其二,末句“都国内”中的“国内”不是指国内城,因为高句丽从公元 3 年迁都“国内”,至公元 427 年迁都“平壤”,整整经历了 425 年的时间,期间置于“国内”的都城,除国内城之外,尚有丸都城、尉那岩城、平壤城等。因而“国内”不能与“国内城”划等号,即“国内”并非是都城的省称,而是都城所在的区域名

①《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元年,乙酉文化社 1977 年版,第 130 页。

②《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二十八年条,第 134 页。

③程尼娜《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安徽史学》2015 年第 4 期;马大正、李大龙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二十一、二十二年条,第 132 页。

⑤据《集安县文物志》载,集安县城距离霸王朝有 97 公里,而霸王朝距桓仁五女山城 30 公里。参见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1984 年印,第 69 页。

⑥刘子敏《关于高句丽第一次迁都问题的探讨》,《东北史地》2006 年第 4 期;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⑦《三国史记》卷 37《地理志》,第 350 页。

称。其三,“孺留王二十二年 移都国内城”的记载与前引《高句丽本纪》琉璃王记事中的“迁都国内,筑尉那岩城”存在差异,但这里的记载明显有误,而且这一错误已经被著者金毓轵承认,除了坦承“不知其所”之外,又加了两个“或云”作为标识,这种作法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著者行文至此,含混了三者孰为是,以这种形式作为备注以待日后澄清;另一种是,著者将国内城、尉那岩城、不而城三者混淆为一城。前种情况属于以惑解疑,本身就不足为论,而后者则是错误的。国内城与尉那岩城并不是同一座城,在学界已经是共识;<sup>①</sup>同样,国内城与不耐城也不是同一座城,虽然有学者反复论证<sup>②</sup>,但认同不耐城即国内城的观点依然有较大影响。金毓轵即认为二者为一个,虽然承认不耐初在朝鲜半岛,但后来“移至”鸭绿江流域,其云“三国史记谓国内一云不耐,汉乐浪东部都尉所属七县,有不耐,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其后或移不耐于鸭绿江流域。”<sup>③</sup>故而仍然有必要进行辩证。

《三国史记》并不是将国内城与不而城两者混淆的始作俑者。贞观十五年(641年),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句丽,在考察纪实《高丽记》中云“不耐城,今名国内城,在国东北六百七十里,本汉不耐县也。”<sup>④</sup>尽管《高丽记》的史料价值不容忽略,但对于其中有关陈大德奏报的真实性与可信程度却不能绝对化,尤其是“不耐城今名国内城”的说法显然存在问题。首先,依据《三国志》等文献的记载梳理“不耐”的沿革: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在其故地设置乐浪、真番、临屯以及玄菟四郡,“不耐”是临屯郡的属县之一;始元五年(前82年),汉朝将四郡合并为乐浪一郡,不耐县转归乐浪郡管辖。其后因地理偏远,又在单单大岭以东设置乐浪东部都尉,不耐是其治所;光武六年(30年),东汉减省边郡的同时,乐浪东部都尉被罢置,诸县中渠帅成为县侯,不耐与华丽、沃沮等县都成为侯国。<sup>⑤</sup>随着高句丽的强大,蚕食了岭东之地。正始六年(245年),魏派遣毋丘俭打败高句丽,收复岭东,不耐侯等举邑来降。正始八年,不耐侯至东汉朝贡,“诏更拜不耐濊王”。<sup>⑥</sup>可见,文献中有关“不耐”的记事非常清晰,其位置在单单大岭以东,即朝鲜咸镜南道永兴郡顺宁面所罗里土城。<sup>⑦</sup>只是到了陈大德作《高丽记》时,将不耐城定位在国内城,至金毓轵时以讹传讹。

从史源的角度来看,陈大德的讹误源自于《三国志·毋丘俭传》。据载,正始年间,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幽州诸军,兼领玄菟等边郡军队攻打高句丽,为彰显战争胜利,“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sup>⑧</sup>如果不细致地探讨、分析,很容易将毋丘俭所立的纪功石理解为一块,由此丸都与不耐便是一地。事实上毋丘俭所率魏军对高句丽的战争是经过南北两线策应,多次战斗方达到扼制高句丽发展的目的。正始五年(244年),毋丘俭派北南两路军队围剿高句丽,北路由玄菟太守王颀率领,所经

①关于尉那岩城的位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今丸都城,参见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第1期;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第6期;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第68页;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李健才《高句丽的都城和疆域》,《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耿铁华《高句丽南北道的形成与拓展》,《通化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霸王朝山城,参见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刘子敏《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曹德全《尉那岩城考》,《高句丽史探微》,第115—123页。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李殿福《高句丽的都城》,《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刘子敏《关于高句丽第一次迁都问题的探讨》,《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李健才《关于高句丽中期都城几个问题的探讨》,《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苗威《乐浪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③金毓轵《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版,第240页。

④《高丽记》全本失传。唐人张楚金撰有《翰苑》,雍公睿在作注时,引用了《高丽记》的片段,成为迄今可见的《高丽记》残本。参见金毓轵《辽海丛书》第8集《蕃夷部》,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509页。

⑤参见《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6页。

⑥《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濊条,第849页。

⑦苗威《乐浪研究》,第127页。

⑧《三国志》卷38《毋丘俭传》,第762页。

过的沃沮即考古界所说的“团结—克洛乌诺夫卡文化”分布区,包括我国延边、牡丹江东部直到俄罗斯滨海地区;肃慎南界,即今吉林、延吉、珲春一带,朝鲜咸镜北道之北。为了纪念这次对高句丽之战的胜利,在高句丽的丸都山刻石纪功,其残碑犹存,是谓“刊丸都之山”。南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率领,由岭东七县进入濊人地区,对东逃的位宫进行堵截,并使已经服属高句丽的濊民归降,是谓“铭不耐之城”,此碑今已不见。另外,毋丘俭记功碑既不是出现在丸都城,也非国内城,而是在“丸都山”(今老岭),虽然国内城距离丸都山不远,但不耐距离丸都山却很远,国内与不耐不能通过毋丘俭的“刻”过石头而划上等号。早在清末民初,杨守敬便意识到这一误区,指出高句丽王宫东南走,“过沃沮已至秽貊界矣,其刊石于丸都者,高丽之都城也,其刊石于不耐者,极高丽王所走之地也。一东一西,相去不下千里。合而一之,何其读书之不审也。”<sup>①</sup>至上世纪 80 年代,孙进己等进而认为“王颀之师至沃沮后,即转师北追,因而直肃慎氏南界。不可能南追复北追。”<sup>②</sup>既然毋丘俭刊丸都、铭不耐是两次不同的行动<sup>③</sup>,因而,国内城与不耐城位于不同的地理空间。

直至近代,仍有学者沿袭陈大德以来的讹误,并通过“新”的视角尝试夯实国内城就是汉代的能耐县。比如,从音韵学的角度,认为“国内、不耐、不而,乃一音之转”,进而得出“汉不而县侨置——或国内城初建之时名不耐城”。<sup>④</sup>前文已追溯不耐的沿革,从建置至消亡,其位置始终在单单大岭以东,没有迹象显示发生过迁徙或者侨置。事实上,国内、不耐以及不而三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不存在音转的情况。“国”字在上古属于牙音,声符为或,韵部为职,对应《广韵》小韵国,见母;不字上古为唇音,声符为不,韵部为之,对应《广韵》小韵缶,帮母。显然,“国”与“不”这两个字既不是双声,也不是叠韵,构不成音转。“内”字上古为舌音,声符内,韵部内,对应《广韵》小韵内,泥母。“耐”字上古也是舌音,声符是而,韵部为之,对应《广韵》小韵耐,泥母,两者也构不成音转。“而”字的上古音韵皆与“耐”相同,也不存在所谓音转的问题。《康熙字典》与《集韵》释“而”字曰:奴登切,音能,又《易·屯卦》“宜建侯而不宁”。《释文》郑读“而”曰能,能犹安也;其对“耐”的解释是:耐音能,能也作耐,并引《礼·礼运》曰“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注》曰“耐,古能字”。从这个意义上讲,“耐”与“而”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并不需要曲费周章地音转。

综上,《三国史记》围绕高句丽第一次迁都的地址,《高句丽本纪》中的记载是准确的,而《地理志》则讹误与正确皆有。讹者诸如“孺留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其错误在于将“国内”错记为“国内城”,同时以“或云”的方式带出另外两个城名,试图对“国内城”作注,讹上加讹;甚至罕见地标明“不知其所”;准确者如,“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因而,在解读文本时需要谨慎辩证。

## 二、辽东地区“国内”名称溯源

“国内”是辽东地区浑江东岸的区域性专指名词,与高句丽有密切关系。在高句丽 705 年的国祚中,有 425 年的时间都城置于国内。那么,“国内”是如何得名的呢?

### (一)“国内”地名出现的时间

梳理“国内”的沿革,文献不足征,幸而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在国内城石筑城墙的底部,发现有土筑墙垣,并在城垣内部发现伴出石斧、石刀、石器柄、环状石器以及 14 件陶片。综合推断约在战国时期<sup>⑤</sup>,集安一带已经有城。另有实物佐证了这一判断。1956 年,在太王陵后西侧发现一罐重达七八斤的战国明刀、安阳布、平阳布,其中有少量汉代的半两、五铢、新莽钱;1958 年秋,在麻线沟西

①杨守敬《汪士铎汉志释地驳议》,《晦明轩稿》,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5 页。

②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第 1 卷,第 343—344 页。

③参见朱尖《毋丘俭征高句丽“刻石纪功”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 年第 2 期,第 152 页。

④耿铁华《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及相关问题》,《东北史地》2004 年第 1 期,第 37 页。

⑤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 年第 1 期。集安国内城石筑城墙下的土城不可能是战国秦汉时期所筑,而应是高句丽东川王二十一年(247 年)所筑的平壤城。因为在公元 3 年以前,“这里既无建城的记载,亦无出土文物可证已有古城址的问题。”参见李健才《关于高句丽中期都城几个问题的探讨》,《东北史地》2004 年第 1 期。

大墓东边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三四百斤战国的圆钱以及汉代的钱币。<sup>①</sup> 这些数量庞大的货币基本属于战国时期的燕国。1977年秋,在阳岔乡公社高台子七队大湖附近,出土了一把战国时期赵国的青铜短剑,正面有两行计20字的铭文“十(七)年相邦阳安君邦右库工师吏篆朝治吏庖鞅剂”,背面有五字铭文“大攻尹口口”;<sup>②</sup>1983年,在集安县火车站北,出土两件战国时代的人形车辖。<sup>③</sup> 大量战国遗物的发现,说明塞外的集安是侯国燕的治内区域,属于辽东辖区的重要据点。<sup>④</sup> 综合战国时期辽东郡已经设置于此地,以及集安土城的规模等信息判断,这里是辽东郡的属县,“国内”当是战国时期最初置于此处的土城名称。

迨至秦汉,国内土城一直都在沿用,名称也习惯性保留。西汉昭帝时,将玄菟郡从朝鲜半岛东海岸侨徙来之后,这个具有历史积淀的城被作为西盖马县的治所。在今集安市区的石砌城墙里面,包含着汉代的夯土墙,而且在城内曾出土过汉代的大板瓦;在粮库遗址内则出土过汉代的白玉杯;在集安一带出土过汉代的铁铧、锄、镰等农业生产工具<sup>⑤</sup>。这些器物昭示了高句丽迁来之前这里曾经的繁荣。

## (二) “国内”之名的内蕴

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国”字写作“或”。“或”是会意字,《说文》训“或”曰“邦也。从口从戈,以戈守一。一,地也。”这里“戈”是武器,“一”是土地,含义明确,对于“口”的理解,是认识“或”的关键。在卜辞中,“口象城形”<sup>⑥</sup>,犹如城的外垣,考察《汉语大字典》中从口的字,如围、园、圃、圈等,可以综合得知其具化了“国邑”表达的是“有牢固城垣环绕的、有守卫的都城”。<sup>⑦</sup> 然而“口”字最常用的意义是围绕、包围,从“人所居住”的角度增加意符“人”于口外,为有别于“囚”,是而有邑(邑)字。邑“从口象疆域,象人踞形,乃人之变体,即指人民。有土有人,斯成一邑。”<sup>⑧</sup>可知,“或”与“邑”都是居人之所,可理解为城邑。《说文》训“邑”为“国”。古时国与邑通,更多承载着“城邑”的含义。

从“城邑”的层面来讲,可分为国家的都城与一般城邑两种,“《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尚书》曰西邑夏,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皆是。《周礼》:四井为邑。《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sup>⑨</sup>伴随着“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sup>⑩</sup>意识的觉醒,执干戈以守卫的城池与土地,在用文字来表达时,在外边加“口”字框,这个“口”即是疆域。以武所守的疆域,书写为“國”。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国”的四围都是需要以武守卫的,然而真正有效守卫的则是要塞之地。战国时期在今集安一带所筑的土城是辽东郡塞外属县的治所,有土筑的城垣表明,这里是重要防御的据点。据《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穀梁传》隐公七年条曰“城为保民为之也。”表明城具有防御功能。而城郭、城垣、城墙都是加强防御能力的。《吴越春秋》载:“(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先秦城垣的保护城池安全的功能远远大于礼制功能或者文化功能。因而,集安土城是塞外一个重点防御地点,称为“国”。《国语·周语中》载“国有班事,县有序民。”韦昭注曰“国,城邑也。”<sup>⑪</sup>孔颖达疏《礼记·祭法》曰“国门,谓城门也。”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国人”即城内居住的人,“国内”就是“城内”。作为战国时期燕国所设辽东郡属下的的县城,必然有一个管辖

①古兵《吉林辑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第2期,第83页。

②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张雪岩):《集安发现青铜短剑墓》,《考古》1981年第5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集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2年第6期。

③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第198页。

④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⑤李殿福《高句丽的都城》,《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第20页。

⑥孙海波《卜辞文字小记》,《考古》1935年第2期,第11页。

⑦晏鸿鸣《“中国”语义源流辩正——兼及“口、邑、或、国”相关义间关系》,《江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41页。

⑧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上海督印叶葆渔先生遗书同人会1934年影印。

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⑩《战国策》卷31《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⑪《国语》卷2《周语中》,《单襄公论陈必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0页。

区域,其西界即今天的浑江,“国内”就是对这一个辖区的称谓。

(三) 在成为高句丽的政治核心区之前,“国内”位于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之外

在高句丽的发展历程中,疆域经历了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其扩大是通过“战斗”和“寇抄”<sup>①</sup>实践,并辅以迁都来完成的。在琉璃王迁都之前,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基本上局限于第二玄菟郡郡治高句丽县内,西、南两个方向皆以长城为界与辽东郡为邻;东以浑江为界与西盖马县相接;西北以浑江上游为界与夫余相接;东北以今英额布一带为界与上殷台县比邻。<sup>②</sup>范围没有超出卒本地区以及富尔江流域。如果将高句丽视为“国”,那么这一区间之内就是第一次迁都前的“国内”。而名为“国内”的地区是在西盖马县境内,彼时属于高句丽的“国外”。

经过 40 年的发展,至第二代王琉璃王时期,高句丽县境已经不能承载其发展的脚步,遂有第一次迁都。与中原王朝迁都的目的是为固本不同,高句丽迁都是为拓疆,它按照步步为营的逻辑,通过迁都来拓展自己的疆域。琉璃王二十二年(公元 3 年),高句丽首次迁都,其目标地是“国内”,所“筑”之城是尉那岩。这里的“国内”当时是在高句丽的核心范围之外。事实上,高句丽两次较大幅度的迁都,迁入地不仅是在王畿之外,甚至是原本的疆域之外,以后期的平壤城为例,高句丽在西进受挫,南进取得成功的情况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美川王十五年(314 年),将中原王朝所设置的郡县势力排挤出朝鲜半岛,导致乐浪、带方两郡内徙至辽西,大同江流域在“自主”地由当地的汉人治理 1 个世纪之后,即长寿王十五年(427 年),为规避与西方政治势力的摩擦,获得便捷的海上通道,尤其是强固好太王以来的拓展成果,加强对朝鲜半岛的统治<sup>③</sup>,高句丽迁都于域外之平壤。同样道理,高句丽的第一次迁都之地也是域外,具体地点“国内尉那岩城”即今集安市霸王朝古城<sup>④</sup>,这里是第二玄菟郡西盖马县的辖区,相对于当时的“高句丽国”而言,是“外”而非“内”。

对于“国内”的理解,不能按照“顾名思义”的逻辑,认为它是在某“国”的“内部”,因为从行政管控的角度,无论是玄菟郡,还是西盖马县,都不能称为“国”;从沿革上来看,在历代的分封之中从未有一个侯国、王国或者其他的“国”被分封于此。虽然文献之中有关于盖马国与句茶国的记载,但事实上,两者皆是位于西盖马县辖区之内<sup>⑤</sup>的地方势力,属于聚落而非邦国。因而,被逃逸的郊豕带到高句丽人视野之内的“国内”,绝非(高句丽)国家之内<sup>⑥</sup>之意,在郊豕以及一众高句丽人来到此地时,“国内”就是该地的称谓,是久已存在的地名。总之,“国内”是汉语词汇,是地名,高句丽琉璃王迁都于国内之后沿用。琉璃王先在国内的土城(西盖马县治所)内临时行政,同时在国内修筑新的都城命名为蔚那岩城(今霸王朝山城)。大武神王则在西盖马县治所在之战国土城的基础上,砌筑石墙,坚固城池,名为国内城,同时将都城从蔚那岩城迁至国内城。于是“国内”成为高句丽王畿的代称,其范围大体是今天集安市辖区,以及朝鲜慈江道一带。

### 三、《三国史记》中的“国内”与国内诸都城名称分析

排除前述《三国史记·地理志》有关国内与国内城的不准确记载,《三国史记》中其他所有的记述都逻辑清晰,彼此可证。梳理文本,主要有如下几种:琉璃王二十三年春二月,“立王子解明为太子,大赦国内。”慕本王二年(49 年)秋八月,“发使赈恤国内饥民”。新大王二年(166 年)春正月,“宜推恩而及远,遂与众而自新,可大赦国内。”山上王二年(198 年)夏四月,“赦国内二罪已下”。东川王十七年(243 年)春正月,“立王子然弗为王太子,赦国内。”“立王子药卢为王太子,赦国内。”这几种史

①《三国志》卷 30《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国人有气力,习战斗。”高句丽民族的性格是“性凶急,善寇抄。”第 844、433 页。

②刘子敏《“高句丽县”研究》,《东北史地》2004 年第 7 期,第 15 页。

③朱尖《高句丽都城变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 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32 页;王欣媛《高句丽“南进”研究》,东北师范大学 2017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14 页。

④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一),第 264 页;刘子敏《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2 年第 4 期;曹德全:《“新国”与“故国”简析》,《东北史地》2004 年第 3 期;高於茂《霸王朝山城之考辨》,《东北史地》2002 年第 2 期。

⑤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第 1 卷,第 264、266 页。

料之中包含三个重要信息:首先,事件集中发生在高句丽第二代琉璃王至第十二代王中川王之间(4—255年),属于高句丽前期历史。其次,六则史料之中,三条记载了因立新王太子而“赦国内”;其余三条是在新王继位的第二年,或“赈恤国内”或“赦国内”,都与高句丽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再次,六则史料皆是法令层面的。是时,高句丽处于由草创到逐步发展壮大时期,尤其是五部制从雏形到完善时期。高句丽到来之前,“国内”本指第二玄菟郡之西盖马县辖区。在高句丽迁都之后,这一区域先后承载了高句丽前期的几个都城,比如今天的霸王朝山城、山城子山城等。今集安市辖区在高句丽五部的凝聚过程中,成为王部,即桂娄部,在称谓方面仍然沿用继往,称为“国内”。相比于战国至西汉前期,桂娄部所在的“国内”范围明显缩小,是由东迁的卒本夫余人、古高句丽人和当地的高夷部落盖马国、句茶国部众以及部分汉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sup>①</sup>五部时期的高句丽并未形成中央集权制,相对而言,各部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各部长官拥有相当大的行政管辖权。<sup>②</sup>除王部桂娄部之外,其他四部皆非由国王直接辖治,国王所颁发的法令能够下达到各部的长官(大加)层面,但是不能直接施达至各部大臣与部众。尤其是高句丽的司法由诸加评议会掌握,因而,无论是上述史事,还是烽上王九年(300年)八月“王发国内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宫室”之事,举凡由高句丽王下达于“国内”的命令,都并非宽泛的“国家之内”,而是“国内”之地,即桂娄部,也即今集安市辖区,延至朝鲜慈江道一带。

高句丽以国内的尉那岩城作为都城的时间不长,在大武神王末年<sup>③</sup>,便迁都于西盖马县所在地,沿用了故有的土城设施,是为“国内城”,桂娄部就此形成。国内城的名称首次见载于《周书·高句丽传》:“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湫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sup>④</sup>排除前引属于误载的琉璃王二十三年“移都国内城”,关于国内城的最早记载是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年)“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sup>⑤</sup>那么,在故国原王“又筑”国内城之前,对于这个实体城是如何称谓的呢?检索《三国史记》可知,从大武神王至故国川王,频繁出现关于“京都”的记事:比如,大武神王二年(9年)“京都震,大赦”;二十四年(41年)“京都雨雹”。闵中王三年(46年)“京都无雪”。太祖大王七年(59年)“京都大水,漂没民屋”;二十年(72年)“京都旱”;二十五年(77年)“京都雪三尺”;七十二年(124年)“京都地震”。故国川王十二年(190年)“京都雪六尺”。这里的“京都”,我们判断即是国内城,因为自从高句丽迁都于丸都之后,便再没有关于京都的记事。

京都的取代者是丸都。《三国史记》关于丸都的最早记事出现于山上王二年(198年),始“筑丸都城”;十三年(209年)“王移都于丸都”。东川王二十年(246年)“俭攻陷丸都城,屠之”;二十一年(247年)“王以丸都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有学者将尉那岩城与丸都城视为同一城<sup>⑥</sup>,根据前引《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可知,琉璃王二十二年,高句丽迁都于国内,并修筑尉那岩城。这与山上王二年(198年)“筑丸都城”的记事相抵牾,因为很明显,这两次所修筑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座城,因而尉那岩城与丸都城不会是同一座城。

在高句丽前期的历史中,国内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第一次迁都是从纥升骨城迁到“国内”的尉那岩城(今霸王朝山城);第二次迁都是从尉那岩城迁到“国内”地区的战国至西汉时期所修筑的土城,也就是《三国史记》中记作“京都”的“国内城”前身。据《北史》载,建安年间,公孙康攻打高句丽,“破

①刘子敏《关于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第27页。

②杨军《高句丽五部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6页。

③有观点认为是在大武神王九年(26年)。参见刘子敏《关于高句丽第一次迁都问题的探讨》,《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第11页。

④《周书》卷49《高丽传》,第884页。

⑤《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故国原王十二年春二月条,第159页。

⑥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第1期,第93页;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第68页;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第47页;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李健才《高句丽的都城和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辑合刊;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470页。

其国 焚烧邑落”京都被毁于一旦。山上王于在位的第二年(198 年)“更作新国”,修筑新都丸都,并于十一年迁至丸都城(今山城子山城)。至正始年间,丸都城被毋丘俭攻破,高句丽在京都旧地以石修筑平壤城,这个“平壤城”就是位于今集安市内<sup>①</sup>的“上平壤”。高句丽移都于此,此后大兴土木,广筑宫室。烽上王七年(298 年)冬十月,“王增营宫室,颇极侈丽”;九年八月,“王发国内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宫室。”此工程持续时间较长,在集安城内曾出土一枚有“太宁四年”(326 年)铭文的灰色卷云纹瓦当,物证了当时宫室的修筑情况。不过,故国原王四年(334 年)秋八月所增筑的平壤城,以及四十一年百济王率兵所攻打平壤城,皆非国内地区的平壤,而是位于大同江流域原王俭城故址上所建的平壤城,因为,在高句丽的挤压下,乐浪、带方两郡先后于 313、314 年侨置于辽河以西,乐浪郡治朝鲜县内的汉人势力渐趋微弱,高句丽人遂控制该地区,并有意识地增固旧有政治中心,在这种背景下方有故国原王四年的增筑“朝鲜县”故址。为强化自我意识,高句丽人将“平壤”地名南携至新扩充来的区域。而且,彼时百济主要在汉江流域发展<sup>②</sup>,不会将战场扩展到国内。然而,故国原王十二年春二月,在“修葺丸都城”的同时,“又筑”国内城,这应该是在石筑平壤城的基础上加筑的,从而使这座石城更为完善且坚固。此后,“国内城”频繁见载。由于学界没有关注到“京都”、“平壤”与“国内城”是同一地点不同时期所筑之城的称谓,所以历史真相在错乱地名的释读下难以澄清。

综上所述,由于《三国史记》所叙述的史事与著者的生活时代相距久远,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源自中原王朝的正史。<sup>③</sup>但中原修史时,往往详诸内而略诸外,有关边鄙之地的信息有限。虽然有今已失传的《古记》等半岛史相佐证,但《三国史记》仍然存在含糊甚至讹误的问题。围绕早期都城,不仅由尉那岩城迁往集安土城一事没有明确记载,而且混淆了国内城、尉那岩城、不耐城,更没有关照到京都、平壤、国内城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城名的转换与变更线索没有得到清晰记载,导致今天的历史解释歧说纷呈,莫衷一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句丽渤海研究专项”(17VGB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苗威(1968—),女,吉林梨树人,山东大学东亚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 The Interpretation of “Guonei” and “the Guonei City” in *Shih Chi of Three Kingdoms*

MIAO Wei

(Research Center for East Asian Documents,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Shih Chi of Three Kingdoms* is a significant East Asian historical document written in Chinese, however some records in it are too simple or ambiguous to be interpreted, among which Guonei, the region where capitals of Gaogouli were located in its early historical period, is very typical. Though the record of Guonei in the *Biographic Sketches of Gaogouli Kings*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at in *Geographical Zhi of Gaogouli*, history of Gaogouli's capitals located in Guonei is not clearly expressed in the record of *Shih Chi of Three Kingdoms*. Guonei, name of the region north of the Yalu River and east of the Hunjiang River, had a history of clay-built city, named Tucheng, which date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Era. Since Gaogouli's relocation of their capital to this region in 1st century, Weinayan City, Jingdu, Wandu City, Pingrang and other citi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or rebuilt into capitals. One of those capital cities, whose names are Jingdu, Pingrang and Guonei city in the sequence of time, was rebuilt on a same site of Tucheng in the Warring States Era and underwent several times of renovations.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arefully examination when it comes to interpreting Guonei in *Shih Chi of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Shih Chi of Three Kingdoms*; Guonei; the Guonei City

<sup>①</sup>此说始于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丸都及国内城的位置》,《史学杂志》25 编 7 号,中国学界认同者较众,如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 年第 2 期、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56 页)、苗威《高句丽“平壤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 年第 2 期)等。

<sup>②</sup>苗威《百济前期历史与地理述考》,《韩国研究论丛》2013 年第 1 期,第 208 页。

<sup>③</sup>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 页。